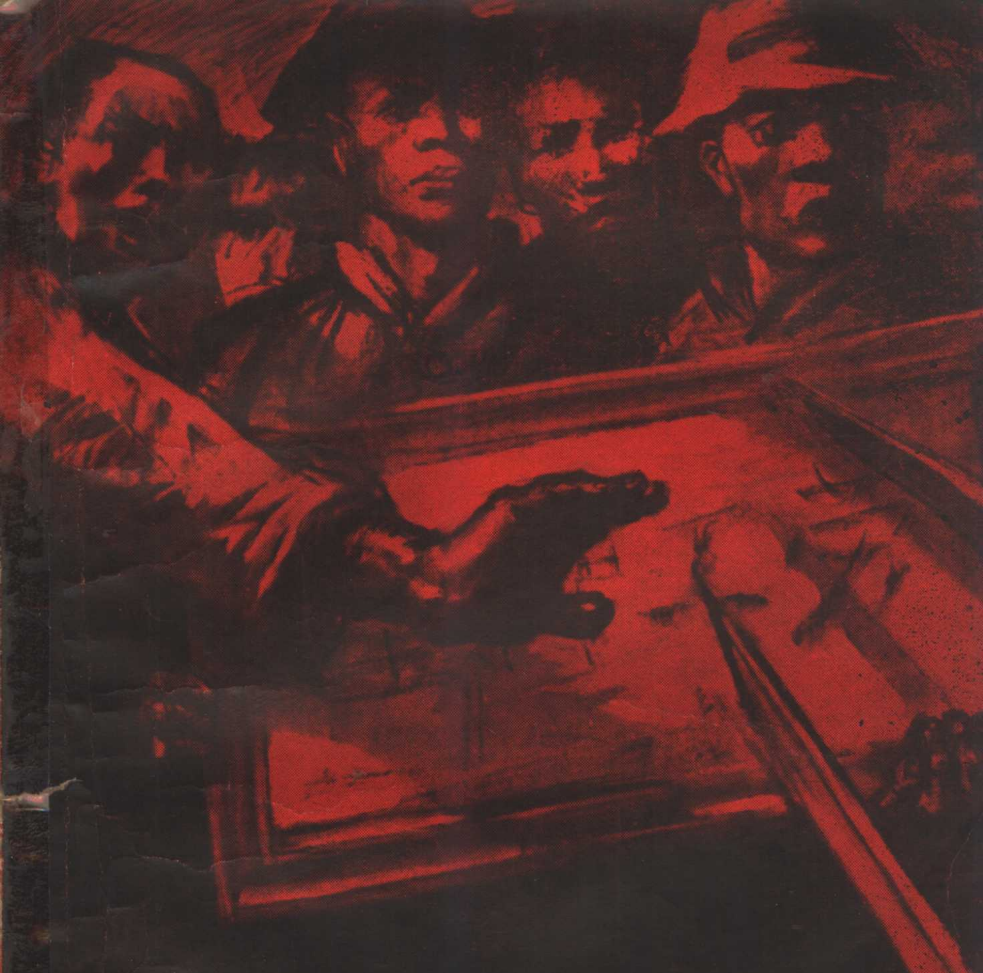




“二七”回忆录

棲梧老人



“二七”回忆录

胡德平 著

“二七”回忆录

樓梧老人著
裘沙繪圖

工人出版社

1957年·北京

二 七 回 忆 录

棲梧老人著

麥 沙 繪 圖

*

工人出版社出版（北京前門外大街20号）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02号

工人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發行

*

开本:787×1092 1/32

字数:62,000字 印张:3 6/16 插页:3 印数:1—32,000

1957年10月北京第1版

1957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

*

第一書号:16007·50

定价:(6)0.34元

统一书号:10007·50

定价: (6) 0.34元

目 录

流浪在武汉	1
转变的一年	14
开端	28
摸索中前进	35
人力車工人同盟罢工	46
陇海铁路罢工	46
初到郑州	51
江岸一夜	56
一个青年工人	62
暴风雨前	70
英勇的战斗	80
血染江岸	87
各地的斗争	95

流 浪 在 武 汉

一九一九年的夏天，武汉热的透不过气来。大街小巷都是屎尿淋漓，垃圾成堆，经过太阳的蒸发，就是臭气熏天，遇着一场大雨，变成屎尿横流，泥濘满地；地下的狐鼠与空中的蚊蝇，非常活跃，连达官贵人的楼台庭院也受到它们的光顾了。

当时我住在武昌大关帝庙十二号一个小旅馆里，前门有便池，后门有粪坑，中间一个大天井，终年污水盈寸，臭不可当。我住的房间在天井旁边，每到黄昏时候，蚊虫撞破脸，一到天明又是苍蝇飞满室，加以铺板上的臭虫，窗檐上的蜘蛛，阴湿地上的跳蚤，真是骚扰不堪。有时候，室内发现毒蛇和蜈蚣，就更使人苦恼了！心想搞一次清洁运动，把臭虫和跳蚤镇压一下，再买床蚊帐，或可得到暂时的安静。但是事实上，我既没有时间，也没有钱：即令搞一次清洁运动，又哪里能够改变这种龌龊污秽的环境！

这里是武昌最便宜的旅馆，连住房带吃饭每天二百四十个铜钱，每月仅费七串（千）二百个铜钱，合成银元不过两三块钱，因为便宜，住客很多；其中主要的是法政学生和各学校毕业了业就失业的青年，还有少数打官司的乡下人；倒也

是形形色色，構成一個小小的社會。

這些人住在一起，一樣出房租、膳費，冷暖却有不同。法政學生多半是地主豪紳的執袴子弟，他們是有錢有勢的人物，老板待若上賓；他們的膳食費用是整月或整季的預付，老板對他們是必恭必敬，稱某少爺、某先生或稱某相公、某老爺；那些失業的學生是窮措大，膳食費是三天一交，一個禮拜一結，付不出膳食費的人，自然要受老板的白眼和冷落。甚至有的時候連名帶姓叫罵一頓，以至攆趕出門，逼得那些窮苦的青年面紅耳赤，不得不典當衣服行李清償旅館費用。古人說：“床頭黃金盡，壯士無顏色。”真是話不虛傳！

我雖然有點零星收入，還可以按月付出膳食費用，沒有受到老板正面的奚落，但是處境也并不比那些失學失業的青年好些。我看不慣那些趨炎附勢、擅作威福的行為，因此，同老板發生過幾次口角，同那些執袴子弟們打過架，樹立了不少仇敵。就這樣在混亂中住了一年多！

一天夜晚，我又同老板吵了一架，覺得再住不下去了，就想設法遷居。我把那一天的新聞稿件寫完已是午夜一時了，加上思想上的不安，蚊子和臭蟲的侵襲，真疲乏極了，很想找一個安靜一點的地方睡一覺。我想蛇山頂上沒有人烟，那里或者沒有蚊子和臭蟲，至少比這個醜陋的小旅館風涼一些，就悄悄地拿了一條臥單跑到蛇山頂上。

这里倒是涼風習習，寂靜無聲。我在一個多年不用的要塞炮台旁邊的草地上，揀一塊地方埋頭睡下。心想：如果沒有毒蛇和夜鬼來侵擾，這一睡必定要到日上三竿才起來；

不料剛剛入睡，脖子上好像針刺了一下似的，又痛又痒，用手一拍，打死了一個又長又大的蚊子，一會兒嗡嗡之聲，越來越密，簡直招架不了，这里的蚊子比旅館里的蚊子厉害得多，不能再入睡了。一陣苦惱，便翻身爬了起來。

我在山頭上，一邊緩步，一邊極目回顧，武漢三鎮的夜景，歷歷如畫，江上的清風，山間的明月，頓時把心中的煩悶，身上的疲乏沖洗盡了！漢陽兵工廠不斷的向江面吐出火光，武昌紗布絲麻四局與第一紗廠的烏煙繚繞，相映成趣，京漢鐵路與粵漢鐵路隔江相望，龜山在前，洪山在後，不僅是形勢天然，從工商業條件來說，真是中國內地唯一無二的一個生產城市。我在这里生活了六七年，總以為武漢是一個爭名奪利的是非之地，罪惡的淵藪，一個墮落腐化齷齪不堪的城市，今天夜晚竟發現它有無比的美麗。心想，那些壞東西是人为的，如果有一個好的政府，有一種清明的政治，有一個好的市政建設計劃，武漢三鎮市民的幸福生活是有希望的！想到這裡，精神興奮起來，睡意全消。連忙拾起臥單，走下山來。

這時，報曉的更雞齊鳴，街上已有三三兩兩的行人了。路過龍王廟，忽然發現了奇跡。這個沒有香火沒有住持的破廟，向來是乞丐棲息之所，破爛與污穢是應有盡有的，我差不多有一個多月沒有到這裡來，這個破廟變樣了：亂草剷平，瓦礫撿盡，廟門兩廂雖然還是那樣破爛，但是清靜無嘩，並沒有一個乞丐。再看看廟門虛掩，左上方挂着一個嶄新的招牌，上面寫着：“啓明化學工業社”，這引起了我的好奇

心，信步走了进去。

里面仍是空曠破落，無大变动，正殿上仍然是龙王爷的塑像，神气十足，只有左廊下睡着兩個人，远看似乎是两个乞丐，走攏去一看，原来是我的同班同学閻少士和陈治安。我把他倆叫醒了，他倆坐了起来很惊奇地問：

“你怎么来得这样早，怎么知道我們在这里呢？”

我們互相談了别后的情况，才知道他們也是因为畢業以后找不着工作，回不得家乡，流浪在武汉很久，才找亲戚朋友借了一点錢，准备做点小本生意，因为不懂生意經，又改变方針，买了兩套做粉笔的模型做粉笔卖。在抵制仇貨运动中，各学校都联合不用日本貨，中国商人很少做这种經營，即令有做出来的，也像石头一样硬，写不出字来。他們利用在学校里的一点化学知識与做手工的經驗，来搞这种行業，做出成品不比日本貨差，比中国商人做的好，更以抵制仇貨，提倡国貨，在爱国运动的高潮之下，以学生的身份，亲自拿着粉笔到各学校商店推銷，几乎把武汉各公立学校半年用的粉笔都包下来了，竟是生意兴隆，財源茂盛，兩三个月之間，除了吃喝成本，还淨賺了二百多塊錢。因此信心十足，滿想大干一場。正好找着这个破庙，挂出那样一个招牌，还准备招股，扩大經營呢！

“我們已經开始制造油墨和漿糊了。”閻少士有些兴奋又有些难为情地說。“当初我們不过是謀个飯碗罢了，想不到学政法的倒办起实業来了！”

我也苦笑了一下。心想这也是这个社会的古怪現象。

一个人要存在下去，不得不在夾縫中去討生活。

接着，他倆又告訴我，剛開始的時候，從買原料，製成成品，向各學校商店推銷，都是他倆自己動手，照說成本低，應該利潤大；但是由於在市場上沒有信譽，各學校一貫都是用日本貨，日本貨一般的說比中國貨好，所以製成的東西推銷比較難，幾乎賠了錢。五四運動以後，展開了抵制仇貨運動，在學生聯合會與各界聯合會的支持之下，國貨抬了頭，他們半年多的積貨在一個多月當中便銷售一空，還有很多學校、商店繼續來定貨。

問說：“我們想從這一方面或可以找到一個安身立命的所在！你能够加入我們的活動嗎？能出錢也好，能出力也好，就是不出錢不出力，能够出一個名作為啓明化學工業社的發起人，在精神上支持我們也好！”

我說：“我也是一個迷途的羔羊，想奔赴光明，但不知哪里有光明，我當新聞記者也是為了生活，同你們做粉筆賣是一樣的，就我所知道的，時中書局是失業的學生辦的，利群書社也是失業的或者將要失業的學生辦的，這都是不安於現狀又找不着出路的一群，國家不管我們，社會不管我們，我們為了要活下去只好自己干起來，你們干吧！我對做生意不感興趣，我給你們當股東沒有錢，當學徒嗎？那是八十歲學吹鼓手，一世無成。我對於這個世界氣悶極了，我真想找一個終南捷徑，來一個一掌打碎黃鶴樓，兩足踢翻鸚鵡洲，像孫悟空大鬧天宮那樣來把這個世界改變一下，越快越好，我沒有像你們那樣的耐心，像苦行僧似的，搞這樣的行

業。人生几何？到甚么时候才能看得到一个清平世界啊！”

閻問道：“你的終南捷徑是甚么呢？”

我說：“揭發社会的黑暗！”

閻問：“你的武器呢？”

我說：“一枝鉄笔！”

閻問：“一个人一枝笔能够起多大作用呢？”

我說：“这就看事在人为了。总之，这个社会不改变是不行的。”

閻說：“你的想法太不现实，不过同利群書社那些朋友有些相同。”

我問：“他們如何做法呢？”

閻說：“那說起来話長，你最好是去訪問一下，也是一个新聞材料。”

我說：“利群書社的組成人員我也知道几个，我以为他們同你們和时中書局是一样的，他們真有与你們不同之处嗎？我真要去訪問他們一下。”

閻說：“你要我們介紹嗎？”

我說：“我是新聞記者，用不着要人介紹。”

閻說：“他們对你不会說实話的。”

我說：“等到需要你們介紹时我再来找你們。”

談到这里我就准备要走，他們拿出一份啓明化学工業社的組織大綱及招股章程給我，要我替他們作义务宣傳，并要我同他們常来往。我接受了他們的委托之后，又对这个破庙里的四方八面端詳了一番，倒也清潔宁靜，比我住的那个

小旅館好得多，我馬上靈機一動，問道：

“你們這裡很寬敞，歡迎我住在你們這裡嗎？”

他倆同聲說：“只要你不嫌這裡破爛，我們很歡迎你來！不過我們的飲食吃的比較苦一點，一天吃兩頓，每頓一菜一湯，差不多都是素食，我們是自己做飯，味口到也不錯。”

我說：“我不會做飯，我也沒有時間搞這些。”

閻說：“那沒有問題，橫豎我們是要吃飯的，用不着你動手。”

我當時笑說：今天可算不虛此行了！找了一個比較安靜的住處，又發現了一個利群書社的綫索，今天就先搬家，再去訪利群書社。分手之後，我就徑直回到旅館，同老板算了賬，把一卷行李一個網籃搬到龍王廟，利用正殿上倒下來的一扇破門做鋪板，雖然窄一點，長一點，不大好看，但是這裡蒼蠅不多，蚊子很少，沒有一個臭蟲，攤開了行李，很甜蜜地睡了三個鐘點，趕去了長時間沒有睡好的疲勞。吃了午飯，就辭別了兩位朋友，去訪問利群書社。

利群書社是開設在武昌橫街頭的一個丁字路口上，門前和其他的商店一樣，只是比其他商店簡單朴素一點，店堂的正中間有一張像餐桌的長方形的台子，上面堆滿了上海北京各處新出版的雜誌報章，台上置一個一尺見方的白底黑字的牌子，正面寫着“閱覽台”，反面寫着幾行簡單的閱覽規則，無論何人都可以在那裡閱覽，不取閱覽費。櫃台里面安置兩個又高又大的書架，書架上，疏疏落落的擺了一些書籍，也沒有人守櫃台，出出進進的人很多，買書賣書的交易

却很少，挤了一大堆人，也看不出誰是主人，誰是顧客。

我在那里徘徊了半个鐘点，找不着一个問話的人，一会儿書社的后室有兩個不像工人打扮的青年，抬着一筐垃圾走了出来，我想这总是他們的伙計吧？我就攔着他倆問：

“誰是你們的管事的呀？”

他們答应說：“我們沒有經管管事的人，只有輪流值班的，現在就是我們值班，你要买書報嗎？”

我說：“我是新聞記者，我想採訪貴書社的情況，替你們作一些宣傳報道。”

他們笑說：“我們是甚么也沒有，只有几个人，这个鋪面是租的，販賣的書報是卖了再給錢，我們是中華大學的走讀生，借利群書社作一个宿舍，并可以得到閱覽書報的方便，就是如此而已，我們沒有可以值得宣傳報道的東西，辜負了你的好意。”

說到这里，不等我再問便嘻嘻哈哈地走了。

我碰了个釘子，心想这里門坎真緊，可是也更引起了我对他們的好奇心，接着我就去訪問了好几个与利群書社有关系的人：陈学渭、罗四維、林育南等，他們都是吞吞吐吐不肯說實話，仅仅說这是一个工讀互助的团体。当时一些局外人也多以为他們不过是讀書不成，生活不了，一个穷苦失業失学的一群青年的組織。經過多方面的了解，才知道利群書社，是共存社的事業機構，共存社的發起人是憚代英。到这时我才算找到一些脉絡。

憚代英在中華大學畢業以后，就在該校任中學部的主

任，他是一个信仰無政府主义，而富于想像力的人。他不滿意他的家庭，不滿意他的学校，更不滿意那种社会和国家。他在二十多岁的时候在学問方面就有相当的造詣，頗有文名，他常在“东方杂志”和“大中华”杂志上写文章。他更善于詞令，在教課和任何集会上，講話很有热力，能吸引听众，所以在中华大学各部有相当的威信。他因为不滿意現狀，想在無政府主义的思想体系之中創造一种接近現实的新的 人生，他有四大戒律：不吃酒，不抽烟，不穿綢緞，不做官。有四大願望：改造自己，改造家庭，改造社会，改造国家。有四大工作步驟：个人自修，朋友互助，由乡村教育發展新村运动，由文化运动来發动改革政治运动。后来以这种思想为中心，成立共存社。共存社的綱領，差不多是由他的四大戒律、四大願望、四大工作步驟演繹出来的，利群書社就是共存社最初的一个事業机构，后来恽代英在黃陂、黃岡办过乡村教育；在重庆、瀘州办过师范教育。他在四川任教时，不仅把共存社的社員帶去当教員，并且把共存社的社員帶去当学生，蕭楚女、林育南等都是共存社的主要成員。到一九二二年春，远东弱小民族會議的时候，共产党吸收林育南为武汉学生代表，共存社才与共产党發生联系，它的主要成員差不多都加入了共产党，这些人加入共产党后，共存社即宣告解散，这是后話。

在当时利群書社的組成人員一共也不过十几个至二十几个人，除蕭楚女外，都是中华大学附中、一中、外国語学校的学生，他們差不多都是布衣布裳布鞋布袜，像一群清教徒

似的，对人都是冷冰冰地叫人不可向邇。我想这也不过是無政府主义的流派，不会成甚么大事，也没有兴趣去追随他們。仍然过着白日到处采访，夜晚埋头写稿的生活。

当时，武汉的报館、通訊社很多，他們除有自己的記者外，也約請一些不拿薪水只拿稿費的特約記者，我就是其中的一个，有兩家报館發給了我特約記者証，有了这两个証件，我就可以貫冲直撞了。我采访新聞主要有三个目标，一个是各界联合会，是属于抵制仇貨运动的报道；一个是湖北教育界，是揭發各学校的黑幕如貪污腐化那一类的报道；一个是通过鄂西的几个省議員对鄂西軍政府（是蔡济民、唐克明、柏文蔚等反对北洋政府的武裝組織）的一些报道。这在当时都是合乎时代潮流的新聞，可以刺伤日本帝国主义、卖国政府及軍閥和学閥，因此采访来的新聞很有市場。

有一天，我到省議會秘書長蔡养朴那里去采访新聞，因为他教过我几何代数，我們算是师生关系，虽然他不大喜欢我，可是他有責任接見新聞記者，發布應該發布的新聞，所以我常到他那里走动。那一天他把省議會無关重要的两个議案交給我作为新聞發布，并一本正經地对我說：

“你是我的学生，我不能不对你說直話，一个讀書人去当新聞記者就是末路，这种行業不仅辛苦，而且危險，一句話或是一件事到了你們的口头笔下，都变成了嘻笑怒罵，总要刺激一些人，甚至罵得不成話，那誰还敢同你說实話呢，又有誰敢同你做朋友呢？截至現在就有不少的人怕你，把你的名字同‘报痞子’联在一起，我听着很为你难过，我劝你

不要搞这一套，去找一个正当的职业。”

他說完之后，只顧抽他的水烟袋，不再看我。我受了这頓沒头沒腦的教訓，頗不甘心，就說：

“自从畢業以后，我鑽了不少的冷窟窿，坐了不少的冷板凳，誰也不理我，低首下心地去找了校長好几次，他給我在附小半个書記（支書記的半薪每月十余元）兼四點鐘的課，虽然生活很苦，地位很低，我还是忍气吞声干了一个学期。八十串錢一年的乡村小学教員我也干了五十天，結果我同当地的豪紳及流氓地痞对罵了一陣，他們兴师动众要同我打架打官司，我被迫离开那个学校，逃到武昌来找学校的老师，誰也不支持我，接着又害了一场大病，逼得我好几次想跳江，真感到天地之大，無我立足之地，想下乡种田，無田可种，想披髮入山，無山可入，在那上天無路入地無門的关头，在旅館遇着一个新聞記者，他吹他当記者的一套混世法宝，啓發了我，我才开始在各报投稿，經過了半月投稿的信用，才得到那兩家报館的特約外勤記者，这样才解决我的暂时生活問題。这一年多来，辛勤的采訪，努力的写作，不造謠言，不說謊話，对政治的腐敗，社会的黑暗，好人坏人，如实的报道出来，可以說問心無愧。至于刺激人不刺激人，罵人或不罵人的問題，我就沒有去考虑。您对我的关怀，我很感激，不过，天地間的事，正当不正当是人为的，如果一个坏人做了所謂正当的职业，那个职业就变成了作惡的工具，新聞記者在封建軍閥統治的中国是不值一个大錢的，如果在—个民主国家，新聞記者倒是受到国家法律的保障，社会的尊